

# 问道 与 求索

韩立群新时期以来

文学研究论集

韩立群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 问道与求索

——韩立群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论集

韩立群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道与求索：韩立群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论集 / 韩立群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6

ISBN 978-7-5473-1493-7

I. ①问… II. ①韩…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12769 号

## 问道与求索——韩立群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论集

---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印 刷：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695 千字

印 张：37.75

版 次：201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493-7

定 价：129.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出版部调换或电话 021-62597596 联系。

## 序 治学道路回顾\*

1935年10月,我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县一个叫大岭的滨海小山村。中学时代先后就读于同盟会负责人丁维汾故居所在的涛雒中学(初中)与胶州完全中学。1957年9月,考入山东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75年9月山东师范学院党委派我到聊城创办分院中文系,先后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兼语文教学论研究所所长。1987年晋升教授,199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当选山东省第七届政协委员,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5年被评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被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连续评为“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任中文系主任期间,所主持的“语文教学论”学科(1988年)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学校首个招收研究生的专业(1979年);主持的《高师语文学专业技能培训规程》(1993年)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一等奖。出版学术专著:(1)《郭沫若史剧创作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2)《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中国语文革命——现代语文观及其实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4)《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版);(5)《以生活为本位的基础教育论——叶圣陶基础教育理论体系阐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6)《现代女性的精神历程——从冰心到张爱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7)《走进张恨水小说世界》(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8)《中国现代小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9)《鲁迅作品教学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后两部为合著)等。其中《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获山东省优秀科研成果奖和中国北方15省区18家出版社优秀图书奖,参加国际书展,列入《中国出版年鉴(1995年)》;《中国语文革命——现代语文观及其实践》与《郭沫若史剧创作论》被国家图书馆列为特色资源图书,前者

\* 刊于《聊城大学学报》与新浪网,收入聊城大学文化建设丛书《名人风采录》(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为珍本书库珍藏;《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任副主编),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有很大反响。先后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获省部级以上科研与教学奖多项。1993年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一等奖,我因此被国家教委邀请参加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教师节表彰颁奖大会,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

## 二

1961年,我于山东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于著名学者田仲济先生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在田先生指导下开始步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当时先生为研究室制定了一个庞大的五年研究计划,总课题是“现实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发展”,包括“鲁迅的现实主义道路”“茅盾的现实主义道路”等6个子课题。我承担的是第一子课题。我那时资历虽浅,但血气方刚,刻苦攻读,志向远大,颇为先生看中而加倍培养。他给我开出世界文学大师经典著作必读书目,要我先做系统的研究性阅读,而后进入子课题研究,并鼓励我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榜样,在青年时代就写出《美即是生活》那样的经典著作。梦想化为我向科研目标冲击的内在动力和超常的生命力、意志力,废寝忘食,奋进不息!然而正当我三年的呕心沥血结晶为第一项成果时,灾难性政治运动从天而降:田先生以“反动学术权威”罪名遭批判,而我辛勤研读所换取的则是“修正主义苗子”这顶帽子。五年研究计划被腰斩而终,但整整三年拼搏研读却成为我步入科研殿堂的第一块铺路石,使我在理论、知识和治学方法上都打下坚实基础。

## 三

我系统的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从教学实践中发现和选择研究课题而又以科研成果提升教学质量并服务于社会,是我始终恪守的原则。我的研究范畴包括现代文学研究和语文教育研究与实践两个方面。现代文学研究是我研究工作的主体。可以把课题转换分为如下6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鲁迅研究。

拨乱反正时期,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首先是恢复鲁迅真实历史面貌,而史料的研究与系统整理则是其中第一项工作。我的鲁迅研究便是这时在薛绶之先生带领下从史料研究与整理开始的。从1975—1986年,我们主持编写了《鲁迅作

品教学手册》《鲁迅作品教学初探》(后者为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两部作品研究和《鲁迅生平史料丛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鲁迅著作研究资料丛书》三种史料丛书。其中《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共五辑六卷264万字,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1—1986年陆续出版。由于这是当时关于鲁迅生平思想最系统翔实、编写态度也最认真的史料丛书,适应了社会民众重新认识鲁迅和社会青年知识饥渴的心理要求,所以出版后引起意想不到的轰动。不仅国内主要报刊相继发表评介文章,而且香港地区和海外一些报刊也有不小反响。《中国文学》(1987年第3期)以英法两种文字向国外作了报道,说该书“堪称鲁迅生平的百科全书”。蒋锡金先生于《人民日报》(1982年10月19日)发表题为《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伟大鲁迅》的长篇书评,肯定丛书出版对于重新认识鲁迅和深化鲁迅研究的意义。《鲁迅著作研究资料丛书》是山东鲁迅学会提出并责成我们主编的,曾列入山东文艺出版社计划。全书拟分甲乙丙三编。编写工作始于1982年初,1984年甲编5辑除《野草研究资料》外均已完稿。其中《故事新编研究资料》由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遗憾的是,由于出版社的原因,丛书其他部分的出版计划夭折了。这是我们深为痛惜而又无能为力的事,当时尚无著作权法及具体出版合同作保障。1985年3月,薛绥之先生在为出版奔走中不幸因心脏病突发而猝然离世,事实使我感到资料研究已成畏途。但这段资料研究却成为我从事文学史研究、鲁迅作品和思想研究的基础。20世纪70—90年代,我所发表的鲁迅研究论文便是上述资料研究理论的升华,其中代表性篇目有:《中国现代精神文明的伟大建设者——鲁迅》(提交于1981年山东省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以笔名利群发表于1981年9月8日《大众日报》,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学术论文集》);《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认识和表现人生》(发表于《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收入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故事新编初探》);《鲁迅杂文文体理论及其实践》(发表于《东方论坛》1999年第4期);《以大众为本位的语文改革论——鲁迅语文观的内涵》(发表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等。

第二阶段是文学史研究。

拨乱反正时期,山东文学界思想观念解放的突出标志是由田仲济、孙昌熙两位资深教授主持,山东文艺出版社出面,组织山东四所高校(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和聊城师范学院)重新编写和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分类史。我是主要编写者之一,先后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981年第3次印刷)和《中国现代小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朝鲜文译本2002年11月由韩国亦乐出版社出版)两书的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共8章41万字,由4人执笔,我写了其中4章约17万字,并协助主编统稿。这是“文化大革命”后

第一部现代小说史,在体例上采用人物形象系列建构模式。由于可供参考借鉴的同类书籍极少,逼我认真研读小说文本和大量研究资料,并将心得与发现随时写成论文发表。以此,在完成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任务的同时,又出版了一部独立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后以体例和观念创新而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热切关注,有系统评介文章发表于《文学评论》等刊物,也曾为一些高校选为教材,是改革开放后较早翻译介绍到国外的文学分类史。

第三阶段是郭沫若研究。

我和其他爱好文学的青年一样,早就是“球形天才”郭沫若的崇拜者。但把郭沫若作为研究对象加以系统研究考察却是从1979年开始的。这是因为在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中,我承担的任务是撰写郭沫若专章(上下两章约46000字)。为此,我通读了《郭沫若文集》(文学卷),并在此后开始了以其历史剧为中心的研究。标志性成果是一部《郭沫若史剧创作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和20余篇反响较大的论文。《郭沫若史剧创作论》问世后,颇受青年学者和在校研究生与大学生欢迎。一些学者、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山东社会科学》《戏剧文学》《作家报》等刊物、报纸发表评介文章,如王光东教授讲道:“这是近年来郭沫若史剧研究中的新收获。《郭沫若史剧创作论》不是对郭沫若史剧创作的一般性阐释,它是从文艺美学的理论高度出发,在对郭沫若史剧作品的具体感受和理解以及各部作品相互联系的整体把握中来研究郭沫若的史剧创作的。因此,本书的重要特点首先在于理论的深刻及结构的完整。本书提出了以往研究者很少提到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作家的‘史识’在史剧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本书论者认为,作家的‘史识’在史剧创作过程中是联结‘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键,‘史识’不仅决定了作家对历史精神和历史真实的把握,同时也决定了作家对剧中人物命运的理解和艺术性处理。这一观点的提出无疑抓住了历史剧创作的核心问题。”

20多篇论文影响较大的是:《郭沫若的文艺观及其发展》(发表于《郭沫若研究》1983年第2期,1984年获山东省普通高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论郭沫若历史剧的历史真实》(发表于《郭沫若研究》1985年第3辑);《从人物塑造看郭沫若历史剧的浪漫主义特色》(发表于《郭沫若研究》1987年第3期);《论郭沫若历史剧中悲剧人物的意识特征》(发表于《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3期);《论郭沫若历史剧的语言特色》(发表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人大资料复印);《论郭沫若历史剧的情感因素》(发表于《文史哲》1986年第6期,人大资料复印,后收入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等。

第四阶段是沈从文研究。

我的沈从文研究是从1988年开始的,那时正是席卷全国的“沈从文热”从感情

激荡进入理性反思的时期。若说此前的沈从文研究其主旨是从政治上为沈从文拨乱反正,那么此后的研究主旨则是文化反思与审美发掘。因此,我的研究从开始就采取了文化与审美的视角,并把此后出版的沈从文研究作品定名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从1988—1995年共发表研究论文18篇,出版专著《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获中国北方15省份18家出版社优秀图书奖,列入《中国出版年鉴(1995年)》。《读书》杂志刊发书讯,《中国文化报》等多种报刊发表书评。18篇研究论文中至今仍被阅读和引用的是:《沈从文作品中的自然女性》(《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沈从文论作家修养》(《文史哲》1991年第5期)、《丑的暴露与美的发掘——沈从文与乡土文学》(《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童心映照的军人世界——论沈从文的军旅人生小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等。

第五阶段是女性主义文学研究。

此研究始于2002年,标志性成果是2013年1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45万字的《现代女性的精神历程——从冰心到张爱玲》。另有论文三篇:《女性主义文学的冰心时代》(《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女性主义文学的丁玲时代》(《聊城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女性主义文学的张爱玲时代》(《聊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第六阶段是张恨水小说研究。

该研究始于2006年。标志性成果是专著《走进张恨水小说世界》(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和所发表的10余篇论文。代表性论文是:(1)《中国市民社会批判——张恨水小说社会价值内涵阐释》(《聊城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2)《文化错位的爱情悲剧——〈金粉世家〉中冷清秋与金燕西爱情悲剧的文化内涵》(《聊城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3)《同情的爱——樊家树与沈凤喜爱情的意识特征及其悲剧必然性》(《聊城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4)《丧失精神家园的悲哀——报人文学家杨杏园悲剧心态及其时代内涵》(《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5)《走不出命运怪圈——女伶杨月容悲剧人生的社会必然性》(《聊城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6)《背负国难前行的中国脊梁(一)》(《聊城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7)《背负国难前行的中国脊梁(二)》(《聊城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 四

语文教育研究与实践,包括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两个部分。

理论成果是出版了《中国语文革命——现代语文观及其实践》和《以生活为本位的基础教育论——叶圣陶基础教育理论体系阐释》两部专著,发表了20余篇论文。《中国语文革命——现代语文观及其实践》以翔实的史料,阐释了中国现代语文革命的历史进程:胡适代表的国语建设运动、鲁迅代表的大众语文建设运动和毛泽东代表的民族形式建设运动。这是语文工具解放的进程:白话对文言的解放,大众语对国语的解放和民族形式对洋八股的解放。作为热销不衰的学术畅销书,被国家图书馆列为特色资源图书,为珍本书库珍藏;《以生活为本位的基础教育论——叶圣陶基础教育理论体系阐释》被列入教育学必读书目。

影响较大的论文有:《语文与语文革命——兼论中国语文学的内涵》(《东岳论丛》2001年第2期)、《论胡适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贡献》(《齐鲁学刊》1998年第5期,人大资料全文复印,全国高校学报文摘摘录)、《论四十年代解放区农村通俗小说文体的创造及其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0-11转摘)等。

实践成果是由语文教学研究主持的如下三个相连续的语文改革项目获得突破性成就:《中学语文教师素质培养规程》,于1991年获山东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并被山东省教委定为重点培养项目,下拨扶植经费继续培养;《高师语文学科专业技能培养规程》,于1993年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一等奖;《高等师范中文专业教学体系建构》,于1997年获山东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并被教育部评为世行贷款重大国家项目,拨款1万美元继续深化培养。

这些实践成果不仅深化和拓展了理论研究视野,而且促进了学科建设和语文教育研究的深化,也拓宽了改革思路,为我校教师教育和课程教学论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86年组建的语文教学论研究所,由省级重点学科发展为省重点支持与培养的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和培训基地。

# 目 录

序 治学道路回顾	1
<b>1978 年：</b>	
关于小说《故乡》的几个问题	1
读《湘灵歌》辨析	7
<b>1979 年：</b>	
人民革命的风雷颂	
——论《女神》的主题	14
知识分子的悲哀和反抗之歌	
——论郭沫若的小说	18
<b>1980—1981 年：</b>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革命党人形象	29
中国现代精神文明的伟大建设者——鲁迅	58
目 录	1

## 1982年：

- 叶绍钧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69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士兵和军官形象 77  
田仲济与中国现代文学 87

## 1983—1984年：

- 郭沫若的文艺观及其发展 95  
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认识和表现人生  
——论《故事新编》典型化的方法 103  
戏剧冲突的民族化  
——论郭沫若历史悲剧的冲突 111  
论郭沫若历史剧的语言特色 119

## 1985—1986年：

- 论郭沫若史剧中的历史真实 127  
论郭沫若历史剧中的史识 137  
论郭沫若历史悲剧的结构 147  
论郭沫若历史剧的情感因素 157

## 1987年：

- 郭沫若史剧中的叛逆女性 162  
从人物塑造看郭沫若历史剧的浪漫主义特色 170  
论阿段悲剧艺术构成的层次性 179  
论郭沫若历史悲剧的莎士比亚化 187

## 1988—1989年：

- 乡土作家之路  
——论沈从文的创作道路 197  
勇敢雄强朴素踏实的湘西性格  
——沈从文小说人物论 205

## 1990年：

- 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与同期历史剧的比较 213

论沈从文小说的结构形式	227
论沈从文作品中的自然女性	235
论沈从文作品中自然美的建构	243
郭沫若对中国现代史剧的贡献	254
<b>1991年:</b>	
深化·外化·虚化	
——论沈从文小说的心理描写	264
沈从文论作家修养	274
论《猎人笔记》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影响	282
<b>1992年:</b>	
论沈从文小说的思想倾向性	292
丑的暴露与美的挖掘	
——沈从文与乡土文学	299
童心映照的军人世界	
——论沈从文的军旅人生小说	310
异样的路·异样的人·异样的世界	
——沈从文与艾芜之比较	322
<b>1993年:</b>	
生命哲学的寓言	
——沈从文小说集《月下小景》	331
郭沫若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纪念郭沫若诞辰百周年	342
田仲济杂文的艺术品格	350
<b>1994年:</b>	
茅盾与文学研究会在新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	359
<b>1998—1999年:</b>	
论胡适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贡献	369
胡适的国语教育工具论及其实践	378

胡适对语文学科建设的贡献	387
鲁迅杂文文体理论及其实践	393
以大众为本位的语文改革论 ——鲁迅语文观的内涵	401
<b>2000年:</b>	
论40年代解放区农村通俗小说文体的创造及其意义	411
<b>2001年:</b>	
沈从文研究:谁也无法遮掩的潇湘风流	420
<b>2005—2011年:</b>	
女性主义文学的冰心时代	448
女性主义文学的张爱玲时代	456
女性主义文学的丁玲时代	462
<b>2012—2015年:</b>	
中国市民社会批判 ——张恨水小说社会价值内涵阐释	473
文化错位的爱情悲剧 ——《金粉世家》中冷清秋与金燕西爱情悲剧的文化内涵	484
同情的爱 ——樊家树与沈凤喜爱情的意识特征及其悲剧必然性	510
丧失精神家园的悲哀 ——报人文学家杨杏园的悲剧心态及其时代内涵	519
走不出命运怪圈	532
<b>2016—2017年:</b>	
背负国难前行的中国脊梁(一) ——张恨水国难小说《杨柳青青》中东北军连长赵自强	554
背负国难前行的中国脊梁(二) ——张恨水国难小说《大江东去》中的工兵营长孙志坚	569

1978年：

## 关于小说《故乡》的几个问题\*

### 一、主题思想

关于《故乡》的主题思想，说法不一致。目前流行的是：（1）通过“我”和闰土重逢时所表现的隔膜和痛苦，“揭示了阶级社会的罪恶”，提出对没有阶级压迫的“新生活的希望”；（2）通过“故乡如故”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指示人们寻求新的革命道路。我们认为，《故乡》的主题思想，是通过闰土一家三代反复着同样生活道路的事实，指出封建精神枷锁的束缚，是农民不能改变奴隶命运的主要原因，表现了作者对劳动农民的深切同情和改变劳动农民奴隶命运的强烈愿望。所以这样归纳，理由如下：

首先，从作品本身看，作者巧运匠心通过父子两次到“我”家会面的生活横断面，写出闰土一家三代人相同的际遇：闰土的父亲带闰土到“我”家时，父亲生活困顿，思想愚昧，儿子却是活泼可爱；三十年后闰土带水生又到“我”家，父亲生活艰难，精神麻木，儿子却依然无忧无虑。在这里，作者着重说明的，不仅是劳动农民的悲苦命运：代代相传，世世如故，永远沦于牛马地位，过着猪狗生活。而且更主要的是通过劳动农民从少年到中年精神的巨大变化，指出封建精神枷锁对农民思想的严重束缚，揭示劳动农民世代反复着奴隶命运的主观原因。正是由此出发，作者着力描写闰土精神上的变化：少年闰土聪明勇敢，敢月夜叉刺狡獪，中年闰土却苦得“只是摇头”，面对残酷的社会，他忍气吞声，含辛茹苦，成了一个木偶人；少年闰土天真烂漫，与“我”相处，情真意切，亲密无间，中年闰土却一见“我”就“尊敬”地叫“老爷”，并要水生“给老爷磕头”，当母亲劝他照少年时相处时，他却认为少年时的平等相处，“哥弟称呼”是“不懂事”，不成“规矩”；少年闰土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希望，中年闰土却把命运交给香炉烛台。显然，作者将闰土少年时代同中年时代比较，不是说明农民的生活今不如昔，而是指出封建的精神枷锁对农民思想的严重毒害和

\* 《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5期。

束缚，闰土从少年到中年的巨大变化，不是阶级地位的变化，而是思想精神的变化。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闰土的父亲，就可见他同三十年后的闰土一样被牢牢套上封建的精神枷锁：为希望得到土地，给儿子起名“闰土”，怕儿子死去，就“在神佛面前许下心愿，用圈子将他套住”。闰土的父亲套在少年闰土颈上的“银项圈”和中年闰土捡在手里的香炉烛台一样，都是捆绑劳动农民精神枷锁的象征。

其次，从鲁迅当时的思想情况和创作动机看，《故乡》的针对性就更明显。《故乡》是《呐喊》中比较早的作品，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曾经明白地说明他从事文艺的目的是怒国民的“愚弱”，要用文艺来“改变他们的精神”。他曾将黑暗中国比作“铁屋子”，把不觉悟的人民喻为在“铁屋”内的沉睡者。他写作的目的，正是为向沉睡者呐喊，唤醒他们起来砸烂黑暗的铁屋子。但人民是否会觉醒，铁屋子是否能彻底砸烂呢？这是当时鲁迅思想上深感痛苦的问题。所以，当他谈到革命的前途时，总是把希望寄予未来的青年一代。在一九一八年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历观国内无一佳相，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侘傺而死。如是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在一九一九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说：“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没有法，便只能是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在《随感录三十八》中说：“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祖先的势虽大，但如从现在起，立意改者：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事物（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略略黯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那时便有转机。”

可见，揭示和针砭捆在劳动农民身上的封建精神枷锁，“引起疗治者的注意”，寄人类社会的解放于将来的青年，这便是作者写《故乡》的目的。

再次，从《故乡》写作背景来看，教育和发动农民的问题，正是当时中国革命的迫切问题。《故乡》写于五四运动后一年半，但反映的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二十余年”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在这二十年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但都因为资产阶级的软弱而失败，接着而来的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使中国更加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五四运动“带有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但这个运动在当时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城市各阶层中开展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而五四运动同样没有完成这个变动。

所以,毛主席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也失败了。这是形势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宣传了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获得了新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走俄国人的路”,“宣传民众大联合”,已成为当时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许多先进分子的自觉要求。鲁迅当时是具有彻底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他不仅深刻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而且清醒地看到五四运动中,“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其“寂寞”的原因,仍然是千百万工农劳动群众,特别是占人口最多的劳动农民,没有来参加和响应革命。这是为什么呢?鲁迅当时的回答仍然是革命者没有向劳动农民进行宣传教育,致使他们在封建精神枷锁的束缚下不得解放。鲁迅的这个思想深刻地表现在与《故乡》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中。后来他在《迎神和咬人》一文中说:“自从由帝国成为民国以来,上层的改革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这话虽是鲁迅后来讲的,但却也概括了鲁迅前期对于辛亥革命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

## 二、《故乡》所表现的理想

《故乡》最后写了“我”对水生和宏儿一代的“希望”,希望他们应该有“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生活”。一般都认为这里表现了“我”的也是作者的社会理想。但对理想的内容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鲁迅当时所希望的新社会,不过是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新中国”;有的则认为是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无产阶级社会。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就曾进行过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议会”政治是“千万无赖之尤”的专政,“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失望。十月革命后,鲁迅从苏联看到了希望。他写了《圣武》一文,赞扬苏联十月革命是“新世纪的曙光”。但当时鲁迅还没有看到中国新社会的创造者——新兴无产阶级的力量,对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未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对中国未来社会的认识还是朦胧的。但他坚信新社会一定会到来。正如他后来所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我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答国际文学社问》)这段话说明两个意思:一是鲁迅的无产阶级社会的理想是十月革命后确立

的；二是鲁迅所以相信无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是因为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即“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未来”。但鲁迅在写《故乡》时，他还未有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这从他一九二三年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他说：“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会动弹的。我觉得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因而，我们可以断定，《故乡》中的理想，还是一种朦胧的“新的”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的新中国”，也不是确切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

同时，我们认为从《故乡》的主题思想来看，“我”所希望的“新的生活”还有另一层意思。这就是通过对三种人生的批判，提出为改变人民的奴隶命运，一个人应当怎样生活和为什么生活着的问题。“我”所“不愿意”的三种生活，即指闰土、“我”和杨二嫂的生活。“我”是一个同情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但他对社会的解放并没有做什么工作，他辛苦一生，只为个人“谋食”而辗转奔波；闰土世代作奴隶，“吃人”的社会已榨干他的油，但他仍未觉悟，他一生辛苦劳动，按奴隶的“规矩”办事，为的是作稳奴隶；杨二嫂是个破产的小市民，她明抢暗夺，尖酸刻薄，完全为自己而生活。这三个人都应当是革命的力量，但在那时，由于时代的原因，却都处于尚未觉悟的状态。如果他们不觉悟，只是为个人辛苦，不知道寻求整个阶级和社会的解放，那么“新的”社会是不会到来的，人民将永远反复着先前的命运。作者连用三个“不愿意”，否定了三种人生，表现了唤醒人民觉悟，为革命而“呐喊”的思想。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写的《圣武》一文中曾指出：如果中国人的思想中只是“单有我”，则中国将“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他急切地呼吁：“新主义的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那么中国人应当怎样生活呢？鲁迅那时认为应像列宁领导下的俄国人民那样，“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以战斗去迎接“新世纪的曙光”。这种为谋求社会解放的斗争生活，才是鲁迅在《故乡》中所希望的生活。

### 三、《故乡》的艺术构思

《故乡》不但思想深刻，而且艺术构思精湛巧妙。但对本篇的艺术构思，论者意见也不相同。有的认为，“鲁迅在《故乡》中始终围绕着‘故乡如故’选取和组织题材，塑造人物，表现主题”，作品“以故乡未变，直接写出故乡如故”，“以故人的‘巨变’，间接写出故乡如故”，“以故乡如故，写出了希望故乡不再如故